

20

世纪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郭建宁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



世纪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郭建宁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郭建宁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0

ISBN 7-301-09729-8

I. 2… II. 郭…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研究—中国
IV. B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0417 号

书 名: 20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著作责任者: 郭建宁 著

责任编辑: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729-8/B·034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 × 1240mm A5 10.625 印张 298 千字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20 Shiji

Zhongguo
Makesizhuyi
Zhexue

郭建宁

1990年于北京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中国哲学、文化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主要著作有：《艰辛探索的哲学轨迹——1956至1966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当代中国哲学热点问题透视》（西安出版社1995年版）、《当代中国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现代哲学》（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探》（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已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



内 容 简 介

本书致力于系统地、总体地研究与把握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真回顾、总结、梳理、反思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热点问题、经验教训、发展趋向，对于推动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进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的方向和目标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键与内在机制，试图总结出深层次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有新的突破，分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些争议颇多、复杂性和敏感性很强的争论问题，给予恰如其分的评说，有新的进展，总结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有新的概括。

本书立足于学术前沿，以开阔的视野，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对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入研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适合理论工作者、大学生和其他广大读者阅读。

目 录

导论	(1)
(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	(1)
(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教训	(5)
(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沿问题	(9)
(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前景	(17)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根源、途径和特点	(20)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文化根源	(20)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途径和特点	(23)
二 思想文化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27)
(一)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27)
(二)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33)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	(43)
(一) 陈独秀、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步传播	(43)
(二) 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传播	(51)
(三) 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62)
(四) 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	(64)
四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67)
(一) 毛泽东早期的哲学思想	(67)
(二)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阐发	(70)
(三) 从初步阐发到形成的中间环节	(72)
(四) 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	(78)
(五) 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二	(110)
五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运用与展开	(113)
(一) 毛泽东的军事哲学	(113)

(二) 毛泽东的领导哲学	(118)
(三) 毛泽东的文化哲学	(130)
六 建国初期的学习热潮	(143)
(一) 建国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情况	(143)
(二) 《实践论》《矛盾论》的重新发表	(145)
七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	(150)
(一)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动力论	(150)
(二)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论	(154)
(三)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	(157)
(四)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论	(162)
八 晚年毛泽东的哲学探索	(169)
(一) 认识论的开拓	(169)
(二) 辩证法的思考	(173)
(三) 哲学普及与解放的尝试	(183)
(四) 毛泽东哲学探索的初步评价	(191)
九 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与“文化大革命”	(194)
(一) 阶级斗争扩大化	(194)
(二) 社会主义认识的片面性	(199)
(三) 毛泽东晚年思想研究的方法论	(209)
(四) 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哲学根源	(221)
(五) “文化大革命”期间若干思潮评析	(230)
十 实践标准与解放思想	(245)
(一) 实践标准与“两个凡是”	(245)
(二) 实践标准与思想解放	(247)
(三) 实践标准与实事求是	(249)
十一 人道主义与异化	(252)
(一) 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始末	(252)
(二) 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	(256)
(三) 关于异化问题的讨论	(264)

十二 实践唯物主义和主体性	(271)
(一) 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先声	(271)
(二) 实践唯物主义研究之我见	(275)
(三) 主客体问题探讨	(280)
十三 全球化与文化选择	(293)
(一) 关于文化全球化的可能与现实	(293)
(二) 现代新儒学评析	(300)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311)
附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论析	(317)
参考文献	(330)
后记	(333)

导 论

在新世纪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认真回顾与审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反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教训,评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沿问题,展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前景,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确立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是陈独秀、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初步传播阶段。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陈独秀、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是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则较少涉及。在唯物史观中主要介绍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指出:“社会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经济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精神的构造都跟着经济构造变化而变化。”^① 李大钊则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② 上述见解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很显然,还停留在转述马克思思想的阶段,一些表述也不十分准确与规范。如把经济基础称为基础构造,把上层建筑视为表面构造等。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卷,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 193 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9 页。

二是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全面传播阶段。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着重传播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么,瞿秋白则第一个比较全面地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23 年和 1924 年,他先后出版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三本书。1927 年,瞿秋白翻译出版了苏联学者哥列夫的《唯物论——新哲学》一书,该书附录了瞿秋白自己写的《唯物论的宇宙论概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概念》两篇论文,进一步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中,其新颖之处是把宇宙观与辩证法的矛盾运动观结合起来。他认为,“宇宙现象的根本便是物质的动,动的本身便是矛盾。……宇宙是永久的动、变、改造和发展的过程”。^①在唯物史观的论述中,瞿秋白同样也有不少精辟见解。比如关于唯物史观与多元史观的论述;关于历史发展中客观规律与意志自由的论述;关于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非决定论的论述;关于历史的自由与必然的论述;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论述等。

三是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阶段。从 1934 年 11 月至 1935 年 7 月,艾思奇先后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 24 篇哲学讲话。1936 年 1 月《哲学讲话》结集出版,1936 年印行第四版时更名为《大众哲学》。《大众哲学》全书四章二十四节,十余万字,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等方面阐述了辩证唯物论。《大众哲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日常谈话的体裁,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讲述哲学,把深刻的哲学融化在生动的故事里,使之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易于为大众所理解和掌握。《大众哲学》在大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解放前就印行了三十二版。可以说,《大众哲学》是结合大众所关心的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成功范例。

四是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阶段。李达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曾与雷仲坚合译了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李达先后在一些大

^① 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上海书店 1924 年版,第 205 页。

学讲授社会学(实则马克思主义哲学)。1937年5月《社会学大纲》由笔耕堂书店正式出版,全书五篇十二章,洋洋四十余万字,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等方面,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对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极为重视,并给以高度评价。他称赞《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我以为,这里说的第一本,主要是在“系统化”的意义上使用的。即《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毛泽东不仅在书上写了许多批注,合计约三千五百字,而且把《社会学大纲》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学习,这些事例已足以证明毛泽东对《社会学大纲》的重视程度和浓厚兴趣。

五是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阶段。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生根开花,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他是这样说的:“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须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辩证地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吸取了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在理论内容上进行了改造,并且常常借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民间成语故事以及神话、寓言、谚语、俗语等来说明一些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道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阐发;(2)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3)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诸如军事辩证法、统一战线的辩证法、领导方法的辩证法等等。

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曲折发展的阶段。这主要包括“文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化大革命”前十七年(1949—1966)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两个时期。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比如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辩证法。冯定的《平凡的真理》,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水平。但是这一时期“左”的思想已开始抬头,并日益严重。这无论是在 50 年代末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讨论,还是 60 年代中期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中,都充分暴露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正常的哲学研究被打断,哲学刊物停刊,哲学学术活动停止。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扭曲,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从而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惨不忍睹的一页。

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随着粉碎“四人帮”,实践标准的讨论,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中国哲学从“文革”的历史灾难中走出,哲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哲学课题的价值与哲学工作者的视野,都是以前无法比拟的。总的看,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方法不断更新,研究问题不断深入,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这一时期的哲学研究具有以下显著特征:(1)反思精神,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斯大林哲学模式进行反思,探索新问题,提出新见解。(2)科学精神,即紧密结合当代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3)实践精神,即密切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4)开放精神,即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研究人类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如实践问题、主体性问题、价值问题、发展问题、文化问题、知识经济问题、全球化问题等,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聚焦点和生长点。同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渗透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邓小平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论述,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论述,是唯物辩证法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与发展。

江泽民关于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论述,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运用与发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达到了新的阶段和新的境界。

(二)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教训

总结与反思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教训,笔者以为,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尤为重要与关键:

第一,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建国以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主要采用的是苏联哲学家写的教科书。比如,《辩证唯物主义》是亚历山大洛夫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康士坦丁诺夫的,《简明哲学辞典》是罗森塔尔和尤金的。即使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教材,也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小册子的模式来的。而且几十年一贯制,没有多大变化。随着时代的前进而显得呆板、滞后和僵化,对广大人民群众缺少吸引力。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与普及起过重要作用。但是把它作为哲学教科书的唯一模式,则是不利于哲学的发展与繁荣的。应当指出,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哲学模式是持保留态度的。在建国以后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和批注中,他不仅没有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提法,而且强调要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必抄斯大林”^①。斯大林哲学和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对实践和人的主体性的忽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突出地强调了人的实践的地位和主体性的作用,离开了主体实践这一基本点,是无法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国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主体实践还不够重视。这种情况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了改变,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07页。

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获得了新的生机。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

建国以后,在思想政治领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哲学领域实际上也就确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哲学论断、概念、命题,有许多新的提法、见解、构想,也有不少哲学讲话、批注、笔记。比如两个对子问题、两变问题、部分质变问题、波浪式前进问题、一分为二问题、辩证法规律问题,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引起了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大家从各个方面进行探讨,推动了这些问题的研究。但是也应当指出,在研究毛泽东的哲学观点、见解时,曾出现过不切实际任意拔高的偏向。比如,认为毛泽东“两个对子”(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论断,揭示了全部哲学发展过程的基本矛盾,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新概括,哲学基本问题就是哲学的两个对子;认为“两变”(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一命题既是哲学认识论,也是哲学唯物论,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如此等等。还应当看到,随着“左”的错误不断发展,晚年毛泽东的哲学思维也越来越褊狭。比如在斗争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上,越来越强调斗争性,而忽视统一性;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上,越来越排斥客观规律性,而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在个人与群众的关系上,越来越相信自己,突出自己。并最终形成了政治上的斗争哲学,经济上的冒进哲学,组织上的个人崇拜哲学。这既是晚年毛泽东哲学失误的主要表现,也是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历史悲剧的哲学根源。

第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阶级斗争、政治路线的关系。

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高度的政治化倾向,与阶级斗争和政治路线的关系极为密切。比如“文化大革命”前哲学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过关于阶级性的讨论,像美学领域里美的阶级性,伦理学领域里道德的阶级性,认识论领域里真理的阶级性等等。由于任意地拔高哲学的阶级性、甚至把哲学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搞得人们不敢讲哲学的科学性。不仅不敢提“共同人性”,不承认“共同美”,而且还搞出什么“阶级真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本是

学术讨论,最终搞成了政治批判,严重妨碍了哲学的健康发展。历史表明,一个不重视哲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如果把哲学过分政治化,使之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把本来许多不属于哲学的东西强加于它,使哲学非哲学化,也注定是要遭受挫折、失败、甚至灾难的。

第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怎样使哲学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工具,这是毛泽东一贯重视并致力于解决的重要课题。他不仅发出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的号召,而且身体力行,为哲学的普及与解放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他说:“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本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①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人口众多的大国,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人民中间却获得了广泛的普及,这与毛泽东的提倡与推动是分不开的。但是毋庸讳言,无论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工农兵学哲学中所谓“卖西瓜的辩证法”,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活学活用,立竿见影”,都存在明显的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的毛病。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也多次倡导学哲学。应当说,学哲学是有收获、有成效的。但是成效有多大,与几百本不同类型的哲学教材,数以千万册的哲学读物、辅导材料相比能否成正比,倒是值得考虑的。为什么不停地宣传实事求是,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却比比皆是?为什么反复讲辩证法的全面性,实际生活中的形而上学片面性却屡见不鲜?这是我们在进行哲学的普及与解放时,不能不引起思考的。

第五,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

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45页。

息息相关的。无论是十年建设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研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十大关系的研究。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研究,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关于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研究,都是和社会实践的步伐一致的。当然,从历史上看,哲学与实践的联系具有两重性,即从消极方面看,如果处理不好,哲学可能为错误的实践论证,错误的实践也可以发展错误的理论。比如在 1958 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有人就宣扬“哲学的跃进与跃进的哲学”,甚至鼓吹“破条件,创规律”,人的能动性是“望不到边的”,这实际上是在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进行哲学论证。错误的理论指导错误的实践,错误的实践又助长错误的理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从积极方面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为社会主义实践提供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又进一步促进哲学的发展。比如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思想,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向哲学提出了许多需要回答的新问题,从而促进了哲学的发展,这即是相得益彰。恶性循环与相得益彰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哲学史上都不鲜见。因此,科学地处理好这一问题,意义十分重大。

第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派、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和自由主义的西化派,是 20 世纪中国三大基本思想流派,这一三足鼎立、三派论争的态势,持续和贯穿于整个 20 世纪。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一态势就已经形成:即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主张实现社会主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主张恢复中国固有精神;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主张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到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革命战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大陆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既取得了巨大成绩,也经历

了曲折的道路,还出现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极左思潮泛滥,在批判封资修的口号下,对西方现代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一概加以排斥和批判。到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情况又有了变化,并且出现了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国学热。由于80年代的文化热侧重西学,90年代的国学热侧重中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又一次突出出来。关于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张岱年先生曾提出“综合创新论”。虽然具体操作起来难度较大,但是毕竟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方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和谐统一,综合创新。即经过“同情的了解”,进行平等的交流与对话,最终实现符合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

(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沿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涉及诸多问题,有许多新的生长点。笔者以为,以下几个前沿问题尤为令人关注:

1.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

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对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它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同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条件。当然,实践标准的锋芒所向是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直接针对性是“两个凡是”,因此其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学术意义。

实践标准的讨论在解决了思想政治路线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需要解决的理论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有关这些问题的思考,随着哲学体系改革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导致了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的兴起。1988年分别在天津召开的哲学体系改革研讨会和在北京召开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会,极大地推动了实践唯物主义研究